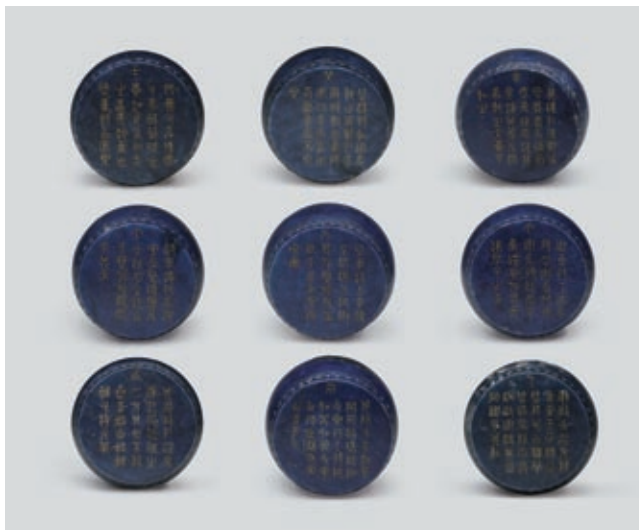




圖一 清 乾隆 石鼓硯及硯盒 硯高約4公分、直徑約1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青金石石鼓 硯高約6.8公分、直徑約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述古而傳今—— 從院藏幾件石鼓文物談乾隆重刻石鼓

侯怡利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有〈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及〈王澐臨石鼓文〉兩冊，以及石鼓硯與青金石石鼓兩組文玩，均屬清宮舊藏；這四件文物與乾隆五十五年八十歲的乾隆皇帝敕令重排石鼓文、製鼓重刻此一事件有著密切的關聯，本文試予分疏之。

石鼓形制的文玩

院藏一組〈石鼓硯〉（圖一），以端石刻大面圓鼓造型，鼓身上下緣皆雕有鼓釘紋飾，硯面沿邊起細棱為硯堂，硯堂上方凹下為偃月形墨池，硯高約四公分，直徑約十一公分，每方硯底部皆刻有「石鼓文」，文字上

方分別有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編號，一套共十件，整套石鼓端硯皆配有鼓型金漆盒，與石鼓端硯形制相同，盒內髹黑漆，鼓身上有泥金繪纏枝番蓮花，鼓面（即盒蓋）上則是泥金繪萬字底紋，其上以黑漆書寫與硯底相同

之石鼓文。

至於另一組〈青金石石鼓〉（圖二），刻石鼓造型，高約六、八公分，直徑約九公分，與石鼓硯相類，整體比例上石鼓硯較青金石石鼓寬扁，鼓面同樣陰刻「石鼓文」並填金，文字內容與石鼓硯上相同，亦刻

有天干編號，這組石鼓共有九件，按天干排序少了「戊」字號鼓。細看石鼓深藍色表面顏色不均勻處，似乎是顏色剝落（故雜八〇），剝落處及鼓的邊緣皆透出白色，或有小部分缺損處所露出也是白底石質，進一步說，石鼓上的藍色僅在器物本身最表層處，這組石鼓可能是由白色大理石作色而成青金石色。那志良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就提及：「在乾清宮點查到『石鼓』形物九件，當時點查的人把它們登記為『青金石石鼓』九件，實際上是用普通的石，製成之後，再染上一層藍色。」與觀察所得相符。由明屠隆《考槃餘事》可知，文房器具中常有「石鼓」造型的「鎮紙」，以此組石鼓之尺寸大小，應為文房珍玩中的鎮紙。

關於「石鼓」

不過清宮為什麼會收藏這兩組刻有「石鼓文」的石鼓造型文玩？在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先來說明「石鼓」。所謂「石鼓」是指唐初在天興縣（今陝西省寶雞市）南二十里許處

文學與經史考據等各方面有濃厚興趣的乾隆皇帝（一七一—一七九九）理所當然會注意石鼓。歷代對於石鼓爭訟的問題主要有三：一、石鼓字數（即搨本考定）；二、刻石年代；三、石鼓次序。對於這些問題乾隆都曾分別處理。

據載乾隆曾命人摹搨大成門內的十枚石鼓，將搨本存放於乾清宮（以下稱〈乾清宮本〉），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時內府收得〈元搨石鼓



圖四 清 乾隆 石鼓（甲鼓）賴毓芝攝

文〉冊，上有趙孟頫音釋，更有趙氏篆書韋應物、韓愈與蘇軾詩，及元明兩代人跋語，收得此冊後乾隆命人詳細與〈乾清宮本〉互相比對，並記錄每鼓比對後的差異，並跋於冊後。按〈元搨石鼓文〉冊是當時清宮所見年代最早的搨本，且「紙墨精潔，所搨字畫，渾厚高古」，比起〈乾清宮本〉字口磨泐漫漶，來得更有意義，經比對後多出的四十六個字，每一個就如同驪珠般珍貴。

除了對搨本的考訂，在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對於石鼓刻石年代的爭論，他列舉唐宋以來諸家之說，但沿襲元以來的看法，認為石鼓〈車工〉篇與《詩·小雅》〈車攻〉篇中皆有「車」、「攻」、「馬」、「同」四字，且語法相似，再加上《詩·小雅》〈車攻〉篇是周宣王時的作品，故將石鼓定為周宣王時之刻石。至於石鼓排序，乾隆則以至元五年（一三三九）潘迪作〈石鼓文音訓〉（潘迪〈石鼓文音訓〉碑一直與石鼓並列於北京孔廟大成門內，現存於北京故宮）來定石鼓的次序。

乾隆重刻石鼓

就在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正月十五日，乾隆皇帝八十大壽這年，他親筆寫下〈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說明重排石鼓詩並重刻石鼓的原因：有感於所見石鼓文搨本上的文字因歲久漫漶，所存不及原有字數的一半，更鑑於石鼓為三代所遺之千古重器，再加上自元以來就置於國子監為「萬世讀書者之津逮」的重要象徵意義，身為一國之君自然肩負保存重要文化遺產的使命。此外，以先前的考訂為基礎，包括確定石鼓所存字數，以石鼓為周宣王時物，在次序及音訓以元潘迪為準等論點，更糾正明楊慎《石鼓文音釋》中偽造石鼓文全本的謬誤。基於糾謬改誤的原則，乾隆下令集石鼓文尚存的三百一十字，重排石鼓詩十首，其中乾隆親自完成首、末兩首，第二至第九首則命彭元瑞按剩餘字排句成章，更命工匠以雲南所產白色大理石刻十鼓，尺寸與舊石鼓大致相同，鼓面上以石鼓文摹刻重排石鼓詩一首，並以天干排序（圖四）。共刻成二套，一



圖三 秦 石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所發現十個似鼓形的石頭（圖三），每鼓高約九十公分，直徑約六十公分，鼓側環刻四言散文詩一首，十鼓共十首，內容記述游獵之事，屬於有一定次序且分章連屬的長篇敘事詩。唐代被認為是周宣王時史籀所書，年代久遠且形制特殊，再加上文字奇古、筆法飛動，通篇體勢渾穆森然，無論在文學、書學、史學以及文字學等方面皆有難以匹敵的重要地位，著名唐代文人杜甫、韋應物、韓愈以及宋代蘇軾皆曾為之賦詩，堪稱「天下第一刻石」。

由於「石鼓」所刻之事相關史籍缺載，使得刻石的時間，歷代說法不一，惟當代學者依石鼓文字、內

容、文體、書法及史實等進行研究考證，大抵主張石鼓應屬春秋中晚期時代之際，大約秦景公時代（西元前五七六—五三七）之物，其說可信度似乎較高，確切的刻石年代仍有待進一步地考證。故石鼓上所刻文字是屬於春秋時秦國的大篆，且由於刻於石鼓上，因此以「石鼓文」名之，為現存年代最久遠的石刻文字。

在唐代，石鼓被認為是周宣王時所作，為三代碩果僅存的重要刻石文物，是以韓愈視石鼓為「至寶」，在〈石鼓歌〉中有「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等句，倡議將「石鼓」置於國子監。事實上，東漢靈帝時就曾將官定版本的《論語》等儒家經典以隸書刊刻成《熹平石經》，立於洛陽太學講堂前；三國魏廢帝正始年間則有《三體石經》以古文、小篆、隸書刻《尚書》、《春秋》及《左傳》三種，同樣立於洛陽太學；唐玄宗則於太學立《開成石經》，是以楷書刻《易》等十二部儒家經典。這些儒家經典內容、文字乃至書體都是經過官方訂正校勘後刊刻，正所謂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除了教科書的實用性外，更有弘揚儒學的作用。

石鼓內容是有關於周代禮樂制度的記載；文體與《詩經》四言敘事詩相類；字體是如「珊瑚碧樹交枝柯」的古文大篆，故韓愈建議將之置於國家最高的教育機構，用來闡揚儒家思想的象徵意義不言可喻。蓋「石鼓」屬於儒家所艷稱的三代遺物；「石經」則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兩者皆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儘管唐廷並未採納他的提議，此後隨著朝代更迭幾經遷徙與散失，但元以後則沿襲此意，於元仁宗皇慶元年（一三二二）移至大都（今北京市）孔廟大成門內，歷經明、清兩代皆存放於此。

乾隆考定石鼓

「石鼓」不僅為三代遺物也是弘揚儒學重要象徵，所刻大篆更是珍貴的文字史料，再加上結字奇古筆力雄健，使得「石鼓」成為歷代書家所臨習的對象，基於石鼓在訓詁、文史、藝術等領域之重要性，因此對藝術、



圖七 清 乾隆 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
北京孔廟 賴毓芝攝

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以國子監生爲懋勤殿行走，並奉旨繕寫篆字，而現存北京孔廟大成門外東側的〈重排石鼓文音訓〉碑，碑末有參與此次重刻石鼓相關人等的題名，其中負責「摹篆」的是「懋勤殿行走戶部員外郎臣趙秉沖」，由此可推知重刻石鼓上之石鼓篆文當爲趙秉沖所書。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趙秉沖篆書〈白行簡五色露賦句〉（圖八），書風承繼唐李陽冰的鐵線篆，正與重刻石鼓上的篆書筆法相似，可以看出趙秉沖篆書圓熟工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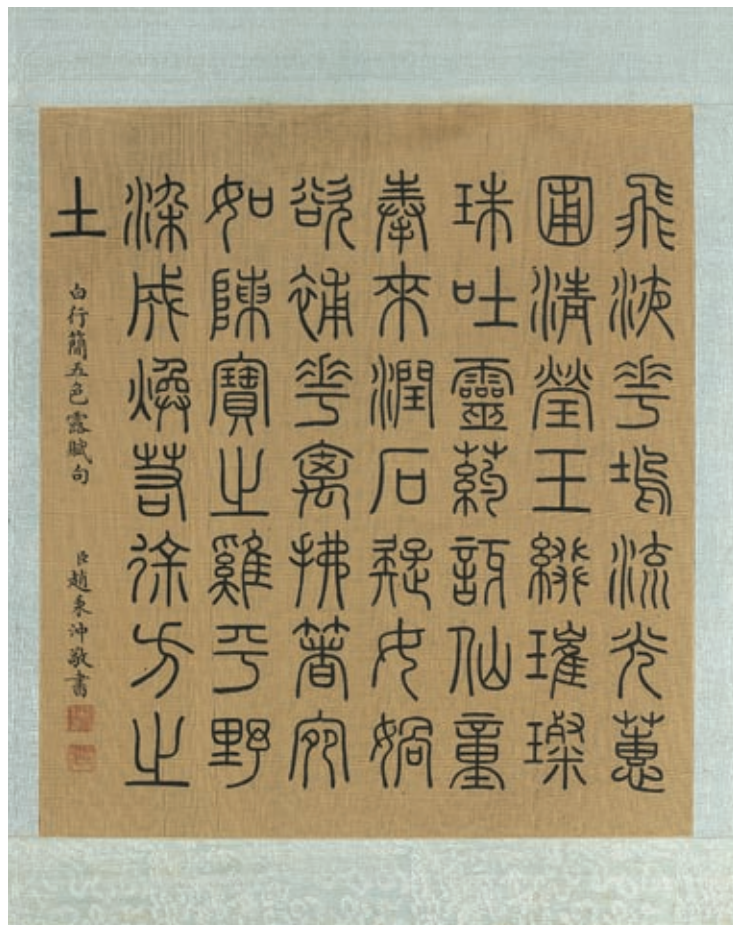
據《石渠寶笈續編》所著錄〈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卷的內

容可知，在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八十歲的乾隆提筆寫下〈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內容更包括十章重排的石鼓文。這些石鼓詩應該早已在此之前就已經完成了，乾隆特別挑在他八十歲生日那年的春正月才將它公諸於世。此外，又據前引

〈趙秉沖列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即命趙秉沖辦理石鼓篆文，於此益可證乾隆皇帝早已在他八十壽辰的前一年就選定石鼓並開始策畫重刻石鼓事宜。

仿古與創新的石鼓

事實上，舊石鼓由於外型似



圖八 清 趙秉沖 白行簡五色露賦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1 北京孔廟大成門東楹乾隆石鼓 北京古都文化歷程資源網站



圖五-2 北京孔廟大成門西楹乾隆石鼓 北京古都文化歷程資源網站

套置於北京孔廟大成門外兩側（圖五）與舊石鼓相呼應，另一套則放置熱河文廟（圖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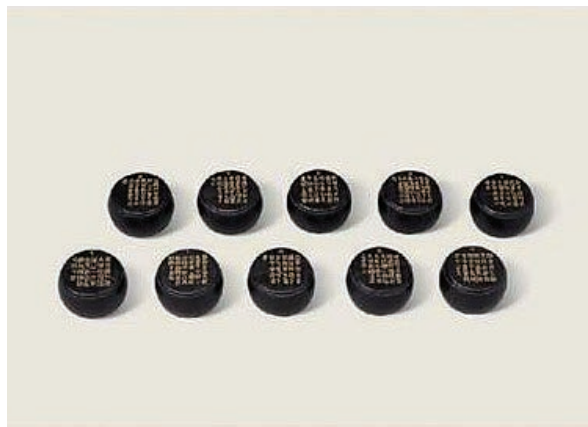
此外，把〈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裱裝成卷，更將此序刻石立碑（圖七），碑陰則刻〈重排石鼓文音訓〉，此乃援引元潘迪〈石鼓文音訓碑〉的體例，音訓全文後則刻

有王杰等衆臣識文，又各置於北京與熱河孔廟。北京大成門外東側立〈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碑〉，另西側的相對位置則是〈御題張照書韓愈石鼓歌〉碑，四面環刻內府所收〈張照書韓愈石鼓歌〉草書卷之文字，碑額則刻乾隆御筆「瓊辭神筆」四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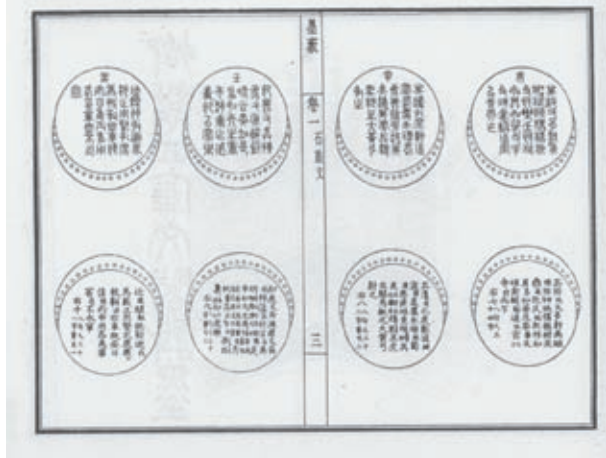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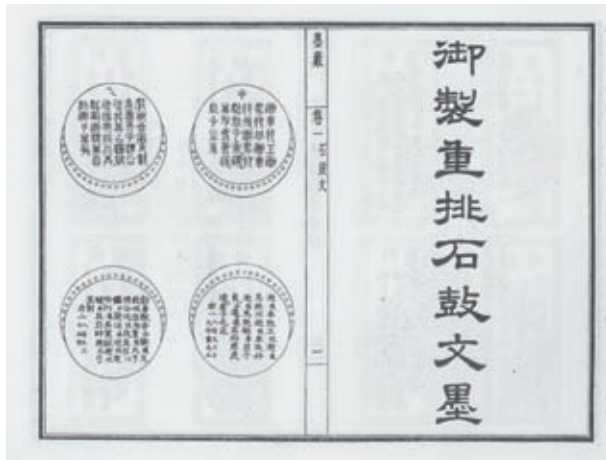


圖六 熱河文廟乾隆石鼓 邱士華攝

至於新刻石鼓上所摹刻之石鼓文是何人所書？查《石渠寶笈續編》其中著錄有〈御筆重排石鼓文並再題石鼓詩〉一卷，本幅內容正是乾隆御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後幅則有「重摹御定石鼓文篆書。款臣趙秉沖奉教敬篆」，又據清國史館傳稿一二八六號〈趙秉沖列傳〉，「（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上以趙秉沖辦理石鼓篆文」，列傳中記錄，趙氏因書畫優異表現，早於乾隆



圖十一 清 乾隆 御製重排石鼓文墨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圖十 清 汪近聖 御製重排石鼓文墨 鑑古齋墨數

十二) 與《王澐臨石鼓文》(圖十三) 兩冊, 據《活計檔》記載, 於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十日進呈如意館, 稍早大學士和坤也進《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按《御製詩集》中同樣寫於乾隆五十年的呈《觀張照草書韓愈石鼓歌長卷作歌》中有「昨近攷訂石鼓文。石鼓文紛不脛走」等句, 可以說明這些與石鼓相關書法作品的進獻, 無疑地, 是由下而

上呼應乾隆重刻石鼓之舉。其中《汪由敦臨石鼓全文》, 寫於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 汪由敦(一六九二—一七五八), 字師茗, 號謹堂, 又號松泉居士, 安徽休寧人, 書風取法唐宋名家, 為乾隆朝重要文臣。汪氏於跋文中說明「右石鼓全文六百卅六字」, 是以乾隆命參與重刻石鼓如王杰等眾臣於後副葉題識, 對於明楊慎偽作石鼓全本的謬誤

「鼓」, 自唐以來即以「石鼓」為名, 故當乾隆欲重製石鼓時, 自然以「鼓」為造型, 重新製作尺寸與舊石鼓相似的新石鼓, 以舊石鼓尚存的三百一十字為本重作石鼓詩, 將重作石鼓詩的石鼓文字刻於最為明顯的鼓面上, 有別於舊石鼓環刻於鼓側。

回頭來看院藏石鼓硯及青金石石鼓兩套文玩, 可確定兩套石鼓文玩鼓面所刻內容, 正是乾隆諭令重排石鼓歌。且石鼓硯無論是硯台底部所刻或是漆盒所書, 鼓面上文字排列皆與新刻石鼓相同。北京故宮也藏有一套《端石做古石鼓文硯》(圖九),



圖九 清 乾隆 端石做古石鼓文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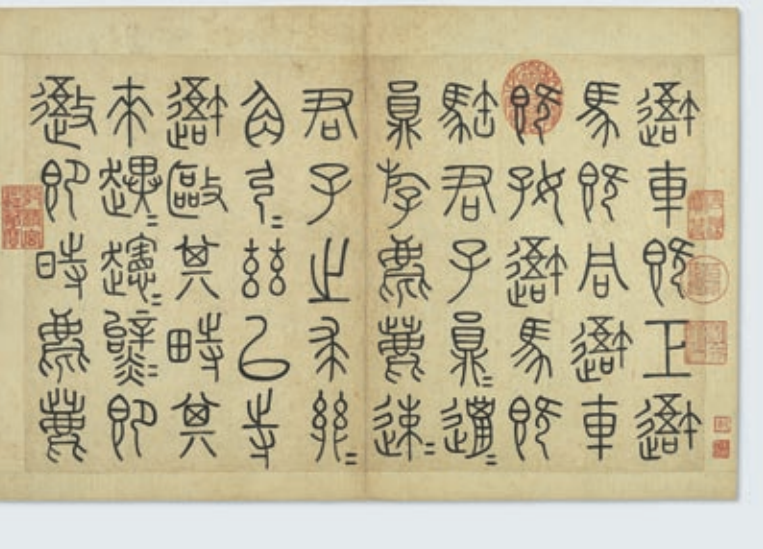
同樣是十方硯一套, 與台北故宮所藏《石鼓硯》尺寸相同, 唯於形制上略有不同, 此組有蓋硯, 闔上硯蓋則為完整扁平之石鼓形, 硯蓋上同樣鐫刻重排石鼓詩, 也有天干編號, 唯此組石鼓文硯底刻有楷書識文, 與乾隆御筆《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製鼓重刻序》中所寫識文相同。

另外, 清汪近聖《鑑古齋墨數》卷二《乾隆朝貢墨》中有一套《御製重排石鼓文墨》(圖十) 與汪氏著錄相同石鼓墨一套現為私人所有(圖十一), 無論實物與著錄其正面所刻乾隆重排石鼓歌空間布局也與石鼓硯及兩套重刻石鼓如出一轍, 只是在材質與尺寸上不同。這些新石鼓儘管材質不同、尺寸各異, 但仍充分反映乾隆時期對於石鼓的認知與想像, 並給與新的詮釋, 可說完全展現乾隆時期仿古與創新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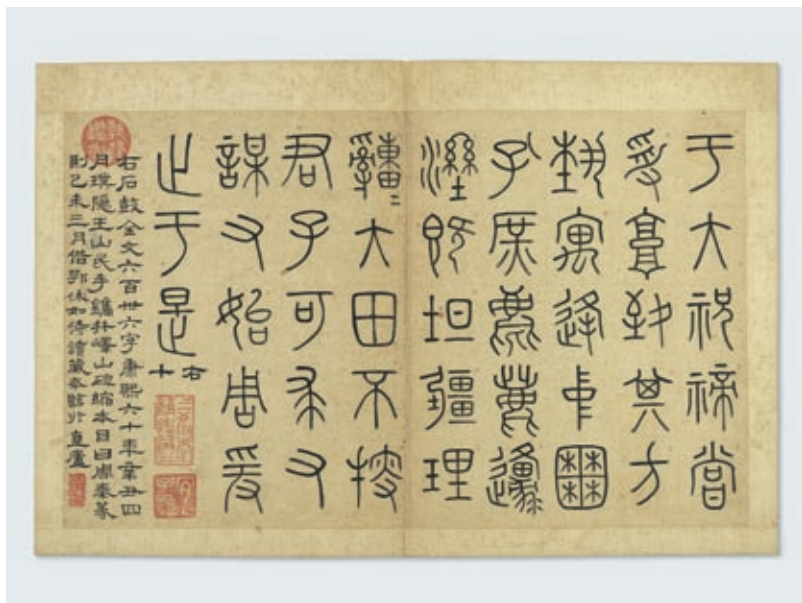
《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冊與《王澐臨石鼓文》冊
院藏《汪由敦臨石鼓全文》(圖

參考書目：

1. (明) 屠隆《考槃餘事》，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1985。
2. (明) 高濂《遵生八牋》，收入《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1999。
3. 《御製詩集》，收入《四庫全書》，香港：迪志文化，1999。
4. 《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5. (清) 汪近聖《汪氏鑑古齋墨戲》，收入《墨譜集成》冊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6. 《石渠寶笈續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
7. (清) 文慶、李宗昉等纂，《欽定國子監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8. (清) 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9. 《清國史館傳稿》，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10. 《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
11.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台北：元久文物藝術顧問有限公司，1993。
12. 《遠古來今—慶祝故宮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清宮故宮文物精品特集》，澳門：澳門藝術館，2005。
13.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圖十二 清 汪由敦臨石鼓全文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王澐臨石鼓文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加以一一駁斥，說明汪氏題記中所謂「石鼓全本」乃沿明楊慎之謬誤，然而由於汪由敦曾為乾隆重臣，是以「眷舊至意仍藏壁府」。

至於同年進獻的〈王澐臨石鼓文〉，寫於雍正八年（一七三〇），

後副葉同樣有王杰等人題識，識文以為：王澐此冊共臨四百六十八字，與唐宋以來諸家字數相去不遠，較元、明兩代字數為多，僅管諸家看法有所出入，但並非如楊慎所偽造有七百二字全文，且篆法與宋薛尚功本相似，

是以總結歷來討論石鼓的看法「鹵莽者多從楊，矜重者多從薛」，若以書法來看，比較這兩冊石鼓文不難發現，王澐的篆書比汪由敦來得純熟，結構嚴謹，筆畫清勁，於是在冊後識文強調「澐精於篆書」，更由於王澐是清初以篆書知名的重要書家，故認定此本與〈元搨石鼓冊〉「皆足供採擇」的重要版本。

再觀新刻石鼓上的篆書，筆畫粗細一致屬鐵線篆，是清初篆書的典型風格，前段曾言〈王澐臨石鼓冊〉與〈元搨石鼓冊〉皆適合作為參考的依據，然在今日清宮舊藏元搨本已不見的情況下，把新刻石鼓及趙秉沖的篆書比對王澐的臨本，可以看到新刻石鼓的結字、篆法皆與王澐書風相近，正如冊後識文乾隆肯定王澐在篆書上的成就，是以重刻石鼓時，在一定程度上參考王澐的篆書。

結論

眾所周知，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不但是國史上在位時間名列前茅的帝王之一，並曾締造出後世所詭稱的「乾隆盛世」。因而，在乾隆五十五年，也正是他八十大壽那年，當成就八次對外「武功」後，乾隆選擇存世最古老也最重要的刻石——「石鼓」，加以考訂並重刻，用來證明其「右文重道」，更進一步塑造自己為「文成武德」之聖君。此外，因重刻石鼓所衍生的各類文房珍玩，不僅是對石鼓重新詮釋的再現，也與乾隆朝盛行的仿古風氣有相當的關連，除了展現乾隆時期仿古文物的創新與多樣性，了解乾隆時期仿古文物的特性，以及此一千古重器是如何透過乾隆的詮釋呈現具有時代意義的全新風貌。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